

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

——李大钊与图书馆

□ 史春风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深厚渊源。“北大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从1917年底入职北大直至1927年4月被军阀杀害，李大钊生命的最后10年与北大紧密相连。入职北大的最初5年，从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受聘为教授）。

李大钊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他认为图书馆是“教育的机关”，要想教育发展，就要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在任期间，李大钊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全方位整顿和改革。1920年8月，《申报》发文称：“北京大学自蔡子民任校长以来，特任李大钊氏为图书馆长。李氏本为社会学专家，对于增进文化事业，夙夕筹思，不遗余力，接办之后，即从整理着手，凡编制目录、改良收藏及陈列诸事，无不积极进行。”

李大钊进入北大工作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之际。入职北大，使李大钊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前沿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朝夕相处，共同研讨，思想迅速发展，而对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又使他得以充分利用图书资源和信息优势，快速了解和追踪世界先进思潮，为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北大红楼那间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发起成立中国最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专门收藏马列文献的藏书室“亢慕义斋”，建立北京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间图书馆主任室成为其工作和从事革命事业的双重阵地。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完成了其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播火者。

现代图书馆理念与改革实践。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

钊将现代图书馆理念运用于改革实践，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从旧式藏书楼向新式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型。

李大钊认为，现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有本质区别。古代藏书楼是藏书的地方，“重藏轻用”，但现代图书馆应该是“研究室”，是“教育机关”。为实现图书馆传递知识的功能，应当充实馆藏，增加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图书，为师生提供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

李大钊将这一理论付诸北大图书馆的馆藏改革实践。在建设馆藏方面，李大钊采取“兼容互需”方针，引进大批国内外书刊。除图书馆自购图书外，还通过征求、捐献、交换等方式收集扩充书刊。他还以身作则，多次捐赠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资料。为扩展西文馆藏渠道，李大钊通过多种途径与美国多家机构和大学建立书刊交换机制。1923年，北大图书馆藏书达184008册；其中中文书140000余册，西文书26356册，日文书2480册，杂志15170册，订阅杂志近600种，中外报纸近40种。藏书量居当时国内大学图书馆首位，全国图书馆第三位。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时，国内鲜有图书馆方面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更缺少规范化的业务方法和技术。李大钊任职后，即着手国际化和规范化改革。上任不久，就亲率工作人员到具有一定西式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学习其先进管理方法。经过两年多的管理实践并参照国内外的管理经验，1920年，李大钊亲自拟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这是北大图书馆的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对北大图书馆业务工作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任期间，他倡导成立了准图书馆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完成了图书馆运行体系的基本架构：包括建立健全图书馆规章制度、建立目录体系、资源共享机制、人力资源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等，这些改革使北大图书馆顺利完成了向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过渡。

北大图书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摇篮。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与北大图书馆实现了“双向成就”，不仅个人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型，也把北大图书

馆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共早期组织的孵化地。

在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论著，完成了思想转型。李大钊也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及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Communist等10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40余种。他还通过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大学讲堂。

在李大钊影响下，一批先进青年聚集在其周围，北大图书馆也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共早期组织的孵化地。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李大钊主持建立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图书室，斋中的很多图书，都是由北大图书馆转来或者代购的。1922年，图书室的马列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包括德、英、日、俄、汉等各种版本。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提到：“有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北大图书馆现存的8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德文共产主义文献，是今天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图书馆主任室，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称“共产党小组”，年底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北京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有16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李大钊图书馆思想的当代传承与启示。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作为北大图书馆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直至今日，李大钊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仍具现实启示意义。

李大钊是践行职业精神和使命担当的楷模。李大钊被捕后，在其

《狱中自述》的最后一段写道，“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一生爱读书，爱藏书，热爱图书馆事业，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嘱托要保存藏书，“以利文化”，这是文化人的信仰、追求和担当，也是图书馆人的操守。

李大钊是关注教育平等的先驱。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明确主张教育平等：“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撰文指出：“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其后他又主张“多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1920年4月，《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募捐启事”，号召通过募捐“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知识、新学说”。主张教育大众化，实现教育平等，在把“全面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李大钊的这一思想对当代图书馆建设仍具现实影响。

李大钊是跨领域融合的典范。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李大钊将个人的革命理想、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赋予了北大图书馆鲜明的“红色”基因，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图书馆+”、“互联网+”成为新常态，提倡打造高品质文化空间的今天，他的思想和实践仍然为当代文化事业提供借鉴。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与百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已经进入了数智时代。无论图书馆怎样变化，李大钊的图书馆理论与基本指导思想永远不会过时，百年前在李大钊领导下，那一群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求索的年轻人的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居安思危、备豫不虞的意识。《尚书》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强调在未乱未危之前就要思虑可能产生的祸患，从而进行预防。若想实现国泰民安，治理者须对以下五类事情保持深切忧虑。

一曰道。首当忧虑的，便是治国之策是否合于大道。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管子·牧民》云：“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城郭沟渠、兵甲强力、博地多财，都不足以使国家安定太平，只有“道”才能备患于无形，使国家大安大荣。应当依循治国的大道和规律，制定安邦定国的政策。荀子云：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矣、大累矣。《文子·上仁》云：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征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故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贤明的国君，国家越大越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因为很多国家疆域广大，就伴随着邻国疆域变小；国家强盛是因为战胜了敌国。战胜敌国就会招致怨恨，侵占邻国就会招致很多祸患。面临祸患与怨恨，国家虽然强大，又怎能不担心害怕？所以“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

二曰德。其次需忧虑的，乃是为政者德行是否兼备。如果做到了地大国富，民众兵强，但是没有道德，这样的国家即使处于强盛，也会盛极必衰。《管子·形势解》进一步讲到，“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下之德，虽满必涸。’”没有厚德为承载，强盛的国家也会走向衰弱。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无德，则国非其国，民非其民。

国君实行善政称为“经”，臣子奉行善政称为“纬”。《周语》云：“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圣人在民众中树立威信来消除忧患。为政者治理国家，贵在公正诚信。《袁子正书·治乱》记载：凡有国者，不可以不公、不可以不实、不可以不信。能够做到公、实、信，国家就会安定，否则国家就有危险。

人君治理国家，当关注大道，而非详察小事。《中论·务本》云：“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中论》中所谓的小事近物，指的是耳朵能听出丝竹歌谣的和音，眼睛能看雕漆彩色的花纹，口能说出辩辞慧敏的辞令，心里只懂得短言浅论，手上熟悉的只有射箭、驾车、书法、数术的技巧，身体喜好俯仰旋转、翩翩起舞的仪态。这些足以能够让人欢愉，并且改变人的志趣，但是，这些是古代先王所说的细枝末节。如果只详察于小事而忽略治国的大道、只看到眼前而没有长远的谋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祸患了。

三曰臣。再者当忧的，是贤才能否得用。没有贤德的臣子，何以治国？能否任用贤才与君主直接相关。《体论·君体》论述说，人都希望安定而憎恨灭亡，都希望荣耀幸福而憎恨劳苦屈辱，但最终还是得不到想要的且又避免不了所憎恨的，原因就是不由其道啊！想要宫殿楼宇高大华丽，一定会悬重赏以求得好工匠。对内不会偏袒家族亲人，对外也不会遗漏关系疏远的能人，一定要找到好工匠再予以重赏，这样建造的宫殿才会高大华丽。可是当寻求辅佐贤才的时候就不像选工匠那样公正了，只用那些谄媚奉承、关系亲近的人。所以图谋国事还不如图谋家舍那样周到公正，是国君常有的毛病。这是君主在任用贤才方面当时刻自我警醒之事。

君主当忧虑的是，能否得到忠臣良将，能否使能者在位，贤者在职，能否人尽其才，当忧虑小人是否会扰乱家邦。春秋时期的晏子就非常重视贤才，多次劝谏君主主要忧虑得不到贤才。《晏子春秋·问上》记载，景公问晏子，君主治理国家，什么是当忧虑之事。晏子说：“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说苑·政理》记载，齐侯问晏子为何何患。晏子说要忧患善恶不分。齐侯问如何观察。晏子说：“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矣。”孔子听说之后赞叹说：“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亦无由入矣。”要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无德无能之人才会远离。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 刘余莉

在任用贤才的时候，如果用不贤德的人来评价，也会使人才流失。《体论》云：“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派贤人做事，却与不贤之人议事；让明智的人考虑问题，却与愚笨的人决断问题；派品德美好的人去执行任务，却与邪恶的人怀疑忌他，这又是为政者治理国家一大忧患之事。

身为臣子，也需要有忧患意识。《尚书》云“居宠思危”，当处于贵宠之位时，就要想到危险。《淮南子·人间训》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德不配位者，才不堪任，无功而禄者，则难保其位。总之，依然是有德者才有位。

四曰民。其四需忧的，是百姓能否安定。《孔子家语》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因此，百姓是否安定是君主当忧虑的事情。《尚书》云：“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苛求百姓，百姓难以承受时，便会揭竿而起。于是《尚书》告诫为政者，不要轻易兴起劳役之事，不要轻视人民的劳作，要想到他们的艰辛；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要常常感到危惧，想到危险，才能长保其位。

五曰俗。最后当忧的，是社会风俗是否良善。风俗关乎国运，崔寔《政论》中列出了三方面国家的忧患，都与风俗相关。第一，没有礼仪和法度来节制人的欲望，就会导致奢侈之风盛行。先王治理天下，必定明确法度以禁止民众的欲望泛滥，就如同高筑堤坝以防水灾一样。法度废弃民众就会散乱，就如同堤坝毁坏洪水就会泛滥。例如，如果商铺都卖奢侈品，出售越礼违制的服饰，工匠也制作奢华、逾越礼制的器物。百姓的欲望被引发，竞相购买，家家户户都越过等级奢靡无度。社会风俗就会败坏了，这就是国家的祸患。第二，世风奢侈，农业就会被轻视。因为从事农桑辛勤但获利微薄，从事工商业安逸且收入丰厚，这就会诱导农夫舍弃农桑而从事手工业。农耕人少，工商业人多，即使荒地已经开垦，不精心耕作，怎能丰收？财富积于地中而不发掘，百姓贫穷就会作奸犯科，致使粮食空虚而监狱人满。粮食歉收，就会有饥民，粮食匮乏也无法拯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倾，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最令人焦心的。第三，社会风俗败坏，在位的领导者不惜触犯王法以搜刮财货，愚民则甘冒杀身之祸来出头头，这是天下第三大祸患。以上三个方面都与社会风俗相关。风俗日渐浇薄，与为政者的喜好和导向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当社会风俗败坏之时，需要为政者自我警觉，反躬自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 刘金祥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魏晋南北朝是极具特殊性的一段时期。这一阶段，政权频繁更迭，社会格局持续变动，政治、经济与文化都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风度逐渐形成，展现出与其他时代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而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以丰富的故事和生动的记载，为我们保存了了解魏晋风度最直接的资料，呈现出魏晋风度的万千气象与鲜活图景。

魏晋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地势力相互征伐，战争频仍。无休止的政治争斗，让朝堂之上波谲云诡，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的门阀士族的角度角逐，更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激烈而又残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官宦显贵和文人士子都陷入了充满隐患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一方面拥有巨额财产和大批良田，享受着优渥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担心在纷乱不安的社会动荡中失去一切，甚至性命不保。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安逸享乐与困顿隐忧、旷放达观与忧戚不安、贪逸人生欢愉与害怕死亡到来等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社会独特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图景，这便是后人常常提及的魏晋风度。宗白华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

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顺着这份独特的时代脉络深入探寻，我们会发现，若要细致触摸魏晋风度的肌理，洞悉当时的社会风尚、民间习俗与精神内核，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文化载体。《世说新语》以形象生动的笔触、简洁优美的文字和翔实准确的史料，分门别类地记录了东汉末年、三国期间、两晋时期重要人物的逸闻轶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庶僧道，均在该书中有所呈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潮流风尚。该书编撰者刘义庆深受儒家文化滋养，喜欢招贤纳士，在当时享有美誉。《世说新语》根据内容分类编排的36门中，其中上卷4门依次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无疑浸润着儒家“孔门四科”的神韵和遗风，表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着尊孔崇儒的一面。但全书多有谈玄论佛的表述及蔑视礼教的观点，不难看出刘义庆和他属下的编者们，持有与正统儒家不同的新异见解，呈现出魏晋时期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特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说新语》不仅是魏晋风度的生动载体，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世说新语》向来被视作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开山之作，书中诸多故事语言简练、描写鲜活，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灵感源泉与经典素材。如李白的“昨夜吴中雪，子

猷生兴发”，说的就是王徽之夜访戴安道的事；“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用了晋武帝时有个叫满查说的话。辛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炙”，借用了王恺用牛跟人打赌的事，用“八百里”来指代牛。另外，“少时了了，大未必佳”“覆巢之下，复有完卵”等，这些出自《世说新语》的名言，众口流传，老少皆知。魏晋时代是一个彰显文化价值的历史时期，文人们多为饱学之士，但囿于当时社会生态和政治环境，纷纷转向务虚空谈，我行我素、鄙视礼俗、任意而为，注重人在内在精神修行，追求高妙人格和高蹈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别样展示和流露。由于《世说新语》记载了嵇康、刘伶等诸多名士的传奇人生，特别是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因而该书是研究魏晋名士风流的极好史料。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需四个条件，即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世说新语》一书从“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饮酒”三个维度，对魏晋士人的风流群像进行了描摹和勾勒，展现了上层社会率真任性、自然适意的性格和优雅脱俗、任诞放达的风范。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学有的混乱时代，名士们在老庄哲学中找到了精神依归，但既不能像老庄那样愤世嫉俗，也不敢完全抛弃儒家道统。于是，他们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教义，把三家教义改造成适合自己生存的清淡玄学。

透过《世说新语》的生动记述，我们得以清晰认知：魏晋风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具有不可复制与超越的特质。它是魏晋文人士子在政治权力与道德理想碰撞下，无奈与抗争的精神写照。以阮籍、刘伶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们纵酒解忧，消解悲情，气韵生动，挥洒自如，绽放着至真性情，追求着诗意人生，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所以有人说魏晋风度犹如《世说新语》中的一杯美酒，既浓烈又温婉，既甘甜又苦涩，酒的醇香穿越了千年却依然令人陶醉。

时至今日，《世说新语》的价值依然影响深远。书中数百个成语典故，如“标新立异”“相煎何急”等，早已融入汉语表达，深刻影响着后世文化。而书中《言语》《豪爽》《德行》等篇章刻画的人物形象，在当代社会中仍能找到影子，这也正是其备受后人重视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是记录魏晋历史的典籍，更是一面映照人性与文化传承的镜子，让我们得以在今昔对照中，汲取智慧，感悟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与永恒魅力。

